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唐生明(1)
1939 年晋西事变的前后	陈长捷(74)
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	岳星明(83)
李仙洲率部入鲁反共纪实	赖惕安(104)
石友三酝酿投敌和被捕杀的经过	高树勋(124)
蒋军在豫皖边区勾结敌伪积极反共的罪行	张庆第(143)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	饶少伟(147)
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记	巢 威 黄梦年(164)
湘桂黔大溃退目睹记	曹福谦(172)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	康 泽(179)
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	黄彤光(189)
抗战时期重庆防空黑幕	邹高竞(205)
1944 年天河口民变纪实	金汉鼎(215)
1945 年宜宾大刀会进攻县城的前因后果	刘学超(219)

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唐生明

一 前言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一面被迫参加抗战，一面随时准备卖国投敌，长期暗中勾结敌伪，进行着反共的阴谋活动。我当时是由他亲自派往南京，充当他这“三面政策”的重要执行人之一。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特把我亲身参加的蒋、汪、日联合反共活动的种种内幕和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写了出来。不过事隔多年，记忆不全，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尚望了解当时情况者有以指正和补充，俾使蒋、汪为了坚决反共反人民，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假手敌人来屠杀同胞的滔天罪行，能更全面地揭露出来。这便是我写述此文的目的。

我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务去南京后，又受到了汪精卫的欢迎，他也希望我替他建立一支军队，来实现他所标榜的“反共建国”的“国策”。很显然，汪逆利用我这个黄埔学生的招牌和我大哥唐生智的关系，作为他宣传号召的资本。同时，当日寇发觉了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以后，他们也如获至宝一样把我抢了过去，看成是日蒋重新亲善的桥梁。

尽管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我没有完全做到他们三方面所寄托于我的“希望”，而且对他们三方面在反共问题上的目标一致、而又有彼此间的利害冲突的种种情况，虽不完全了解，但几年间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还是不少。

有人可能不完全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我去执行他的这一项最秘密的任务？这里，我不能不把我的情况简单说明几句。

过去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我一贯讲究生活享受的关系，使我养成了一种吃喝玩乐的“人生观”；要说我从前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的话，也不过是希望更大地满足我那种讲排场、摆阔气的欲望罢了。

我在旧社会中，待人处世总是随遇而安，以少得罪人为妙，凡事总留有余地，不肯过火。因此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也每每成为各方面利用的对象。甚至一些反蒋组织中，我都有不少朋友，他们有些活动，对我也不完全避讳。

过去我对别人反蒋，从不采取反对态度。我内心深处则认为反蒋愈厉害，我大哥唐生智的地位将在反蒋矛盾中更加有利。当然，这对我会更有好处。因此，我什么团体都不愿参加，除了依靠过我大哥外，我一向在耍光杆，可说没有什么根基。直到现在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才使我从新生了根，有了依靠。我决心一辈子跟着党和毛主席！

过去我结识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对我在吃喝玩乐上有需要，我均推心置腹。譬如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便是我许多朋友中最要好的一个。我和他相识近二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但我始终不愿参加军统组织去当他的部下，只是在他工作上有需要用到我的时候，我总是很热心去帮助他。当然，我也经常利用他那种罪恶的特权来满足我生活上的享受和方便。

我是被过去朋友们认为所谓“大而化之”的人，言行一向疏于检点，因此很需要认识像戴笠这样一类“朋友”，可以减去不少麻烦，别人最讨厌特务向蒋介石打小报告，我在这方面却可以少担些心。我和戴笠是无话不谈，他对我的一切也最为了解。蒋介石选择我去担任那样一项工作，当然与戴笠的推荐有很大关系。

至于我和汪精卫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我大哥的原因。我大哥在反蒋方面，曾一度与汪合作；我也因蒋介石排斥我大哥，而参加

过汪、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在广西的反蒋活动。当蒋介石下野后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我又代表过汪和我大哥去向他祝贺。

由于以上种种关系,加上我与汪身边许多人都熟识,所以蒋介石才选派我,而我也敢于去南京。

以下便是我所要叙述的这一段经过。至于我与戴笠在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和我几年间在沦陷区与许多大汉奸往来时所了解到其他方面的材料,我还将陆续写出来,这里只着重先写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问题。

二 蒋介石给我的一个“重要特殊任务”

抗日战争初期,我原在湖南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年初,与酆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干了两年多。这里虽然是一个盛产沙金和桐油木材等的集散地,被一般人称为“金常德”,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和工作都不很理想,因此越来越感到厌倦,想换一个别的工作。当时由戴笠介绍在我司令部任稽查处处长的沈醉便把我这一思想情况向戴笠报告。约在1940年春间,有一天,沈醉忽然送给我一份戴笠的电报,大意说:“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急待当面商议。……”我当即复电表示“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

正当我准备辞职的时候,很凑巧地接到了“常桃警备司令部撤销、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对我的工作安排却没有下文。

我很快地将警备部结束,即去长沙见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他报告结束情况和今后行止。薛告诉我说:“委员长有命令要调你去重庆,我这里就不便再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早一点去。”

我在长沙只逗留了一两天,便回到了东安;因我父亲去世不

久，我的大哥也从重庆回来了。我刚到家没有好久，又接到了戴笠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派了专人送到我家来的。戴的电报是问我回家后的情况，并问我何时可以动身去重庆。我当即复电说明尚须稍待几日，将家务安排妥当方能动身。没有几天，戴笠又来第二个电报催我，并叫我把他一个女朋友张素贞也带到重庆去。张原来是我爱人徐来的私人秘书，一直住在我家，这次也从常德随我爱人到了东安。

正在这时，蒋介石也打电报催我大哥快回重庆，说有要事与他面商，希即起程。我们当时都猜不到有什么要紧事这么急，我也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工作，所以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留在东安，我先去看看情况。

我们到桂林时，杨继荣在车站迎接我们，并告诉我们，已准备好第二天的班机机票。可是蒋介石更性急，他指派了一架专机迎接我大哥和白崇禧，我们便一同去重庆。由于专机起飞时间提前，戴笠没有来得及到机场迎接我，我和张素贞先去重庆国府路范庄我大哥家中。戴接到我们的电话，立刻赶到范庄，把我和张接到他曾家岩住宅。

戴笠这次与我见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兴。我急于要了解这次蒋介石叫我到重庆究竟要我做什么工作，戴却故意和我大兜圈子，不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反而先问我在这种时候我应当做什么、想要做什么？我因自己事前没有准备，以为只是听从蒋介石的安排，经他这一问，反而一下回答不出来。我正在考虑时，他却又趁机为我提出一个前提，就是既要使我生活过得很好，适合我的个性，又要能够一鸣惊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说老实话，我是个公子哥儿，除了希望安排一个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能使我吃好玩好之外，我是从来没有去考虑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经他这么一说，倒使我感到有点诧异起来。我一向性急，便不客气追问他，叫他不要再和我要花样，他当时仍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又把话题扯到不相干的事上去了。

经过了两天这样磨磨蹭蹭，他才慢慢地把话拉到主题上来。我们谈这些话时，大都是在夜间，因为白天他很忙，常有客人来打扰，只有夜晚比较清静。这时除我和他之外，张素贞经常在旁边听，但很少插嘴。戴的另一个情妇余素恒（湖南人，现仍在美国）有时也参加听一听。此外再没有别的人。

蒋介石给我安排的工作，实在是我所猜想不到的。戴笠用极其慎重的口吻对我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戴笠对蒋介石的称呼）同我讲过好几次，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像这样伟大的领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得到你呢！”当时他给我戴上这顶高帽子，确实使我感到飘飘然。

我骤然一下不知如何答复他的话，心里正在考虑；他又接下去说：“校长说你很能干。他在谈到你的时候，还特别说过，过去在武汉讨伐桂系时，你曾拖来过不少的桂系部队，出过不小的力。虽然你以后在广西进行过反对校长的活动，但校长知道那是因为受了何键的压迫，你才去广西的。校长对那件事始终是原谅你，而且也很了解你，对你一直是很重视。”

他一提起过去多年的旧事，使我更不知要怎样回答。他看我不作声，马上又接着说：“校长知道你来了，本来要立即召见你，因为要我把许多事和你讲清楚，并和你研究好以后再去见他。”

我一听到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后，真是感到又惊又喜，当时的心情的确是非常的矛盾：一方面觉得能够再去上海，比起后方在生活享受方面的确要舒适得多，老实说，这一点最能够打动我的心。可是另一方面而我又有点胆怯，害怕出问题，甚至可能送掉性命。我倒不担心汉奸会杀害我，因我同他们许多人过去都有些交情；可是日本人方面我一向无往来，这一点我是毫无把握，到那时叫天不应，谁也不能保我的险。因此我对这样一个任务不敢马上承担下

来，一直在慎重考虑，犹豫不决，拖了三四天，我都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

我平日遇到重大问题自己不能作出决定的时候，总是找我大哥商量，请他给我出主意。这次戴笠却不让我先去和我大哥商量，天天找我谈这件事，好像非要说服我答应不可。他为了要破除我的顾虑，曾仔细给我介绍了当时上海方面许多情况。他一再重复地说：“我前前后后都为你设想过，你去绝对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你不像别人，以你的身份可以公开地去，大大方方地与他们往来，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至于对日本人方面，只要自己多加小心，决不会出任何问题。”最后，他甚至拿他的“良心”和过去两人的交情作保证，说他决不会存心把我送入火坑。话已经说到这样程度，我不能不作出答复了。

约在第四天的下午，我才向他表示原则上我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有一个条件，我只愿意站在朋友立场给他去工作，绝对不愿作他的部下。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所领导的军统是一个很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是很残暴的；我害怕他趁此机会给我套上军统组织这个圈套，以后就得受到组织的约束，那就没有个人的自由了。我很诚恳地向他表示这一意见，并着重说明我不愿作他部下的原因：因为那对我对他都没有好处；主要是我当了他的部下之后，他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一样和他讲真心话；保持朋友关系，彼此都方便得多。

他一听到我原则上已同意去，立刻显得非常高兴，对我所提出的意见，完全都可以接受。他说：“只要你肯去，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也可以指挥，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领导。你这个意见很好，我全部同意。因为你去的任务不同，不必经常和他们往来，这样可以减少你的麻烦，也可避免出危险。不过我在那些地方工作的人，你都得多照顾他们。”

我对他这一些话表示同意之后，他立刻当着我打电话和蒋介石

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见我。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

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

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

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

他的这一套作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这次见面便谈到这里。我辞出后，由侍卫长王世和陪我一同到办公室主任商震的房内，戴笠紧接着就进去和蒋谈了好一会才出来邀我一同回去。在车上，戴又给我戴高帽子，他非常兴奋地说：“校长能这样对你，真是不容易呵！”

大约是和蒋介石见面后的第三天，他便约我和戴笠一同去他的官邸吃晚饭。这次吃饭只有蒋介石夫妇和我们两个人，饭前饭后都谈了不少问题。他问了我过去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的关系，他很注意听我回答我过去和这些人的情况。

在这次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表示出对我的关怀，叫我去了以后，一定要随时与戴笠取得联络，好让他随时了解我的情况。同时，他还用很含蓄的口吻对我说：“你这次去见到过去所认识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作的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宽恕的。”

第一次见面他说要送给我母亲的那张照片已由他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等之后，这次当场交给我。这张照片，我一直把它当作护身符一样看待：抗战时是存放在我母亲身边，胜利后我一直是悬挂在我的客厅中。许多朋友看到，都不明白这幅照片的来历，为什么蒋夫妇要送照片给我母亲，过去我也不便说出这一段经过。

吃完饭以后，蒋介石当面送给了我一万元特别费，当时约值黄金二十两左右。

临到走的时候，蒋介石又很关切地叮嘱我此去务必小心，切不可大意，一定要与戴笠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随时知道我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戴笠传达他对我的指示。

最后，他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听他的口吻和说话时的神情，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我还没有回答，戴笠便抢着说，许多问题还正在研究，要等一等才能走。他点了点头，叫我们要仔细研究，并叫戴笠随时去报告他。

当我向他辞行时，他拉着我的手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

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再见面吧！”

经过蒋介石的“召见”、“垂询”、“训示”和请吃饭、送照片、发特别费等一系列过程，把我的问题肯定了之后，戴笠才正式向我传达蒋介石给我特殊任务的具体内容。

首先是说明蒋介石指示我去的形式是不同于一般特务的秘密派遣，而是叫我不满于大后方的艰苦生活作为借口，公开地去，先到上海去住家为名，再逐步运用过去的人事关系公开和汉奸们往来，等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再逐步去进行有计划的活动。

戴笠在传达这些任务时，虽一再说明不是硬性规定，可以看实际情况相机行事，便宜从事，因为到那里以后的变化必然很多，应根据环境面变化；但由于任务的性质，主要目的必须交代明白。他是由浅入深，一件件反反复复地告诉我，叫我不要忘记，牢牢摆在心上。所以多年来我还能大致记得些。

第一是要我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戴笠说得非常仔细，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感到这是最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还记得他在传达蒋介石对这个问题的指示时，态度显得很慎重，他先介绍和分析当时江南一带的情况。他说：“在那个地区敌后活动的力量，除了我们的忠义救国军外，大部分地方都是新四军所占领。你去了以后，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他们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我们对于发展忠义救国军的工作，是尽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收效不大；新四军却一天天在壮大。”他停了一停，便咬牙切齿地说：“这是我们的耻辱！今后你要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我们要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完成领袖

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他越说越愤慨，我也记得很牢。我至今还记得，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心里还动了一下：新四军能在敌后发展得很快，这不是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不过我了解到只是由于新四军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不能让它发展，虽然它是在打日本人，对国民党也是不利的。我在那种情况下，不但没有反问他，而且还要接受这个“任务”。

我在重庆停留有一个多月。戴笠除了向我讲明去的任务外，也常常向我介绍上海和南京方面情况，还分析过许多大汉奸人事间的种种矛盾，又给我增加一些任务。他叫我要好好利用他们之间利害冲突，在无形中去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便有可能把他们当中一些人拉了过来。他特别叫我注意和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要拉拢好，他认为通过这个人 and 这个组织，就可以使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特务工作联成一片。

我们还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我如何去的问题。戴笠决定不要运用军统特务的关系，叫我凭过去旧的人事关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以避免日本人对我的注意。

经过几次讨论，戴笠决定要他的女朋友张素贞先去打头阵，她也很乐意担负起这一工作。计划先由她去上海放空气，说我过不惯后方的生活，苦闷得很，准备把全家都搬到上海去住，什么事都不想再干。主要是她先去找一个开赌场的老板潘三省为我作好准备。潘在上海多年，过去是经常陪我在上海玩的白相人。这人当时在上海开设了好几个大赌场，与不少大汉奸有往来，各方面都能吃得开。

办法决定之后，张素贞便提早半个月从重庆飞香港，戴叮嘱了她一番，亲自送她上了飞机。

关于我去以后的联络问题，戴笠决定在上海拨一部电台给我使用，他叫我定一个化名。我记得当时他批阅公文的化名，是余龙（这是为了讨好他那个新的情妇余素恒，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龙快婿），我也开玩笑地说：“我就加一个字叫余化龙。”他听了很高兴，

说这一化名很好，“你从此以后便是鱼化为龙了！”其实我以后用的化名很多，连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们都知道我会花钱，戴笠对这一点曾特别提出来，说对我用钱决不加以限制，只要有电报给他，要用多少，随时派人送给我。在生活方面，他叫我越腐化越好，这样可以使人不注意我，而且容易和汉奸们打成一片。他曾笑着对我说：“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许的，是奉命腐化，任何人向校长去告你也没有半点问题。只要别人认为你只知道玩，什么也不行，这样就有办法了！”

我在重庆逗留期间，沈醉也被戴笠调到重庆，很久没有决定他的工作。有一天他到曾家岩戴笠家中见到我，我顺便问戴为什么不给沈安排工作？他说，沈过去在上海多年，对那方面情况也相当熟悉，我去了之后，必要时也可以派沈去上海和我一道工作。当时我还想到我爱人的哥哥徐宗伯，他是刚从上海出来，在上海有些熟人，他是很可靠的人，可以帮我去工作。戴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他后来知道徐宗伯是学土木工程的，当时他正在重庆大兴土木修建房屋，我走之后，便把徐临时拉去帮忙搞建筑。他当时答应派给我这两个人，却一直没有兑现。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戴笠最高兴的一件事是蒋介石把张国焘交给他，他感到非常得意。他告诉我这一情况时说：“连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领导人都来帮我们工作，我们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他更以能作张国焘的长官而感到自豪。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我所认识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中，不少知道我要去香港，他们也曾为我饯过行。这说明当时有人是了解我的。戴笠也没有叫我不露露面，我去和我大哥商量的时候，也常常遇到许多人。我大哥虽不完全赞同我去，但知道是蒋介石亲自找我去布置的，以后并且也和他说明了一下，他除了叮嘱我一番外，也只好勉强同意我去。

我离开重庆时，戴笠亲自送我到珊瑚坝机场，由航空检查所所长姚悟千照料我上飞机。到桂林后，杨继荣早得到戴的通知为我准

备好回东安的车票。当天我就回到家里。我把蒋介石送我一万元分了一半给我母亲，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把这笔钱看成是我卖命的钱一样。我母亲听说我要去上海，很不愿意；她对蒋介石夫妇送的那张照片毫不感到兴趣；经我再三安慰她，才答应我们走。

我带着爱人孩子和保姆等再到桂林，杨继荣曾公开为我钱行，邀了驻桂林的空军地区司令邢某、铁道运输司令蒋鋤欧、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林蔚等人作陪。

戴笠原来叫杨继荣为我们包一架飞机飞香港，当天恰好有中央银行运钞票的道格拉斯飞机放空回去，我们便改乘这架便机。半夜12点才起飞，因为白天怕路上遇到日本飞机袭击，不敢早走。到香港是清晨3点左右，军统在香港的华南区区长王新衡、香港站站长刘芳雄和戴笠派在香港搞经济活动的张冠夫等都早得到戴的通知到机场迎接我们。张在机场即送给我港币五千元作零用钱。

我在香港是住在跑马地龙潜台一号我大哥的房子里。去了没有几天，张冠夫又给我送去港币五千元。

我到香港去，主要是等候张素贞的消息。她先在上海替我活动，我自己在香港也同样放空气，在任何公开场合中，我都表示决心要去上海住家，什么事都不愿再做。

在香港了解我真实情况的人比较少，除军统几个大特务外，只有杜月笙我没有瞒他。他也尽力帮助我，为我介绍关系，还特别写信给他上海的两个管家万墨林和王某，叫他们多帮助我。

等了一个多月，张素贞才从上海到香港接我们。她把一些关系都打通了。潘三省也同各方面接洽好，都欢迎我去。动身前，我给戴笠打了个电报，他回电叫我谨慎从事，并祝我愉快地完成任务，将来更愉快地见面。

我们在张素贞陪同下，于旧历八月中秋那天，乘搭虎脱总统号邮船离开香港去上海。

三 受到了汪精卫等逆的热烈欢迎

我到上海时，潘三省到码头迎接我们，把我们安顿在开纳路他的家中。当天，他为我设宴洗尘时，就邀请了我所希望结识的汪伪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等作陪。我过去不认识李，虽为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两人谈得很投机。

第二天，李士群即设盛宴为我接风，请了许多客人，李对我表示很亲切。我当时还没有料到这么容易地就和他接近了，我所要打通的第一关，却这么顺利，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和李初初往来时，便把事前编好的一整套假东西搬了出来，非常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他。他一再表示欢迎我去和他们合作，还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在上海的一套活动办法，主要是吹嘘他如何搜捕共产党和国民党留在上海等地的地下工作人员、伪南京政权如何日趋巩固、上海社会如何安定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功绩。我故意表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三说明我是到上海来住家的，决不想再从事于政治方面的活动。

李士群这个汉奸特务头子亲自来与我周旋，整天抽出时间陪我玩，不是没有目的的。他除了用种种话来试探我外，还打算用酒灌醉我好吐露出真话来。我警惕性很高，随时提防着他，有时还借故装醉有意说些假话。他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以为经过他亲自考察我以后，基本上已掌握了我的情况。有一天，只有我和他两人在一起时，他突然对我说，他对我的一切情况都很清楚，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他。我立刻看出他还是在耍手腕，肯定他不可能了解我的情况，便故意装出听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正面答复他，满不在乎地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去。

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我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我夫妇去南京见他。我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

明自己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我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我这才勉强答应了。

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我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他要我没有见汪之前应当先见周佛海。周当时是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兼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是汪身边一等红人。过去我就和他认识，又加上湖南同乡关系，我当然愿意先见到他。

周佛海对我去南京，非常高兴，他很热烈地欢迎我，立刻请我们吃饭。他所邀的陪客，都是汪身边的红人，有陈公博、叶蓬、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丁默村等人 and 他们的老婆。这些人当中有大半都是我过去就认识的，大家重见之后，都谈得非常起劲。

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我夫妇吃饭。我们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我们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汪一见到我，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我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他知道我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和我以及和我大哥的关系。李看到汪对我这么亲热，也特别向我表现殷勤。

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也问了我和我大哥很多情况。这里，我只记述一些比较重要的话。

他先向我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他去当汉奸的“理由”。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指蒋介石而言）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我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奸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好回答，只能点点头。

他看我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我看他在河内发出的艳

电没有？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我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我过去没有看到过。

他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我一声：“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我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他听了后，笑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我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但却答不上话来。

当他谈到曾仲鸣被蒋介石派特务打死的时候，却表现出很气愤的样子，连说：“很不应该！”他一再向我说明：“我走出来是事前和他（指蒋介石）说过的，他也认为国家在那样情况下是不能再打下去，把国家的命运那样当儿戏地断送了，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后代子孙。我离开重庆时，是冠冕堂皇走的，又不是偷偷摸摸跑出来，为什么要派人来打我们？”

他看到我对这些兴趣不很大，只是点头微笑，便把话题转到我的工作方面去。我仍然是表示不想做什么，他却提出要先当他军事委员会委员，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以后再慢慢商量。我听了后，还是说只打算在上海住家；他也同意我在上海先休息一下，多了解些情况再说。

当天他就叫周佛海给我在上海准备房子，并叫他送我一辆新式轿车。后来叶蓬答应把他在上海金神父路24号那座花园洋房让给我，我在这里便一直住到上海解放。

到了下午6点左右，所邀的陪客都陆续来了，除在周佛海昨天宴会上见到的那些外，还有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 and 他们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

在那次宴会上，我一直不会忘记的，是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我说的话。他说：“我得到报告，